

寫作基礎知識

湖北財經專科學校漢文教研室編

一九七三年六月

目 录

毛主席的文风是我們学习的光輝典范.....	(1)
-----------------------	-------

第一章 为革命而寫作

第一节	写作必须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	(16)
第二节	到三大革命的火热斗争中去写作	(19)
第三节	写作必须有严肃认真的态度	(24)

第二章 主 題

第一节	文章要有正确、突出、新颖的主题	(27)
第二节	从三大革命实践的源泉中提炼主题	(30)
第三节	选择好表现主题的材料	(36)
第四节	标题	(42)

第三章 結 构

第一节	层次	(48)
第二节	段落	(54)
第三节	详略	(56)
第四节	交代和照应	(59)
第五节	开头和结尾	(61)

第四章 語 言

第一节	纠正错别字	(67)
-----	-------------	--------

第二节	辨析词义	(72)
第三节	句子、虚词的使用	(76)
第四节	数词·量词	(86)
第五节	常用的修辞方法	(89)

第五章 体 裁

記敘文	(101)
第一节 记叙文概说	(101)
第二节 新闻	(116)
第三节 通讯	(130)
第四节 散文	(140)
論說文	(149)
第一节 论说文概说	(149)
第二节 理论文章	(162)
第三节 革命大批判文章	(172)
第四节 小评论	(182)
杂文	(194)
調查報告	(203)
总结	(222)
公文·說明书·協議书	(239)
后記	

毛主席的文风是 我们学习的光辉典范

在中国革命的各个历史时期，毛主席用他那支使四海翻腾、五洲震荡的巨笔，给我们写下了一篇又一篇的光辉论著。这些论著，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宝库，指导着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

在长期的中国革命斗争实践中，毛主席多方面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主席关于文风的教导，是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早在一九三八年十月，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就指出：

“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在一九四〇年二月写的《〈中国工人〉发刊词》中又指示我们：“我希望这个报纸好好地办下去，多载些生动的文字，切忌死板、老套，令人看不懂，没味道，不起劲。”毛主席在延安时期所作的《反对党八股》的著名演讲，更是一篇全面论述文风问题的经典文献。毛主席在全国解放后的许多讲话和所写的一些按语、批示中，也多次阐发和强调文风问题。

首先，毛主席第一次把文风提到路线的高度，把文风问题 and 政治问题联系起来。毛主席指出：“党八股是藏垢纳污的东西，是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在史无

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又明确指示我们，办报纸必须做到“**要有大方向，又要新鲜活泼。**”可见，文风是不能离开方向、路线这个前提的，也就是说，文风是为方向、路线服务的。毛主席给党八股列了八条罪状，其中最后两条是“**流毒全党，妨害革命**”，“**传播出去，祸国殃民。**”可见文风与革命事业的关系是何等重大。

所谓文风，就是讲话或写文章反映出来的作风。有什么样的党风和学风，就有什么样的文风，而党风和学风，是受思想政治路线制约的。刘少奇一类骗子，由于他的地主资产阶级的本性所决定，出于他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的需要，所以在文风上就必然专搞那些“**谎言的混合物**”，把一些违反马克思主义的形容词、副词当作他的“**习惯语言**”，到处强行推销。什么“**最最最**”，什么“**政治中的政治，灵魂中的灵魂，核心中的核心**”，就是这种腐朽文风的代表作。所以归根到底，路线决定着文风，文风反映了路线。我们只有从路线斗争的高度看待文风，才能懂得文风在革命事业中所占的重要地位，才能正确理解批修整风运动的深入发展必将促进无产阶级文风的大发展，才能把改进文风看作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自觉性的一种表现，看作是批修整风不可缺少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我们不将文风问题上的两条路线斗争进行到底，不将刘少奇一类骗子腐朽反动的文风扫除掉，刘少奇一类骗子的谣言和诡辩就还会有藏垢纳污之地。

其次，毛主席揭示了文风和世界观的辩证关系。我们从毛主席在《反对党八股》等文章的论述中可以体会到：文风问题不只是语言形式问题，主要还是思想内容问题；不只是语言文字运用的技巧问题，主要还是立场、观点、方法问

题，不只是写文章的个人风格问题，主要还是世界观的问题。刘少奇一类骗子的反动文风，正是他们资产阶级世界观的一种表现。跟当年的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样，他们“写文章，即使是在写密信，也会有些文理不通的。这也是被他們的阶级本质所决定的，他們无法象我們替他們作注解的时候这样，把文理弄得很清楚。”读他们的文章，是一场大灾难，费力极大而毫无所获。他们的文章的唯一用处，是当作反面教材教育人民。

再次，毛主席给无产阶级文风规定了三条标准，即好文章必须具有准确性、鲜明性和生动性。准确性属于概念、判断和推理问题，这些都是逻辑问题。鲜明性和生动性，除了逻辑问题外，还有词章问题。准确性是鲜明性、生动性的基础，鲜明性和生动性增强了，对准确性也有积极的影响。好的文章在语言上必须鲜明、有力、生动、活泼，沒有学生腔、八股调和死板老一套。我们要坚决反对半文半白、尽量简古、晦涩难懂以及生造词句、不讲究文法修辞等等不良文风。

毛主席关于文风问题的论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的文风理论。而毛主席自己的文章，则是马列主义文风的光辉典范，也是我们学习写作，运用祖国丰富、优美语言的光辉典范。

学习毛主席的文风，首先要学习毛主席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革命立场上，与国内外阶级敌人、与一切“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头子作斗争的大无畏精神。毛主席的著作都是在同国内外阶级敌人作斗争中，在反对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中写成的。毛主席著作，是阶级斗争和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产物。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文风，也正是在与反马克思列

宁主义的反动文风、机会主义路线的党八股文风作斗争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毛主席在大革命时期所著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就是为了驳斥地主资产阶级污蔑农民运动为“痞子运动”，驳斥以陈独秀为头子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攻击农民运动“糟得很”而写的。毛主席在这篇光辉著作中，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革命立场上，以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气魄和波涛万顷的激情，热情歌颂如火如荼的革命群众运动：

……目前农民运动的兴起是一个极大的问题。

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取舍。

这是一篇庄严的宣言，宣告农民运动是中国反帝反封建的主要力量；这是一个严重的警告，警告一切反动派及其在党内的代理人，无论怎样阻挡历史的潮流前进，都不可避免要被农民运动的烈焰烧成灰烬；这又是一个伟大的预言，它预告着伟大的农民运动的风暴即将席卷全中国。毛主席就是这样以雄辩的文笔，“不尽长江滚滚来”的气势，震撼大地的语言，热情歌颂创造历史的人民群众，无情地批判地主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和右倾机会主义者的无耻谎言。

毛主席的著作充分体现了无产阶级鲜明的战斗性和严密的科学性的高度统一。这里所说的战斗性，是指用马列主义改造世界和敢于反潮流的大无畏精神；这里说的科学性，是

指充分的摆事实、讲道理和严密的逻辑论证。毛主席著作中所表现的坚定的立场，伟大的气魄，豪迈的胸襟，磅礴的气势，是同周密的论述，精辟透彻的分析以及无懈可击的逻辑力量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斯大林在《论列宁》一文中曾引证别人的话来说明列宁的演说具有巨大的逻辑力量——“‘好象万能的触角，用钳子从各方面把你钳住，使你无法脱身：你不是投降，就是完全失败’”。毛主席著作中的逻辑力量也是如此。无论是毛主席的演说或文章，都无一例外是思想深邃，旗帜鲜明，结构严谨，语句警策的光辉著作。列宁在《给印涅萨·阿尔曼德》的信中说：“这就是我的命运。連續不断的战斗——反对政治上的各种愚蠢思想和庸俗见解，反对机会主义等等。”正是在和“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斗争中，毛主席的著作显示出强烈鲜明的党性，成了指引革命群众前进的明灯，鼓舞人们斗志的军号和威慑敌虏的檄文。

毛主席批驳机会主义路线代表人物时，不是从头至尾历举对手之语，逐一驳斥，而是用“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的办法，抓住论敌的要害和有代表性的反动论点，或以概括的方式提取出来，或以设问的方式表现出来，或以一针见血的手法勾划出来，然后再加以反击。而在反击时，又采取层层剥皮，一步紧逼一步的写法，把对方的论点驳得体无完肤。这些文章，是充分说理的，有严密的分析，有巨大的说服力。这和那些“企图拿大帽子压服听众，手里并无动人的货色”的党八股文风，是有天壤之别的。

学习毛主席的文风，还必须学习毛主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实际紧密结合的革命精神。毛主席的全部著作，都是为了解决革命的实际问题而写的。这和教条主义者

和修正主义者，生搬硬套、肆意歪曲、空发议论、装腔作势、借以吓人的文风，是完全相反的。因为毛主席著作是中国革命斗争实践的产物，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斗争实际相结合的光辉典范，所以毛主席的文风就具有工农兵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理论和实际的结合，具体表现在文章中就是正确地反映客观事物，做到观点和材料的统一。毛主席说：要“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这种结论，不是甲乙丙丁的现象罗列，也不是夸夸其谈的滥调文章，而是科学的结论。这种态度，有实事求是之意，无哗众取宠之心。这种态度，就是党性的表现，就是理论和实际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毛主席的文章，就是从马列主义原理出发，正确阐明客观真理，达到了观点和材料的辩证统一，理论和实际的完美结合。毛主席著作中的材料，是从中国革命的实际中调查得来的，而观点是根据马列主义原理，建立在可靠材料的科学分析之上的；观点统率了材料，材料说明了观点，理论说明了实际，实际印证了理论，因而放射出灿烂的思想光辉，成了指导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明灯。毛主席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写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就是毛主席深入连队，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调查研究，详细地占有了当时党内各种错误思想的材料，然后以马列主义的理论为指导“加以科学的分析和综合的研究”，提出各种切实可行的纠正办法，从而成了我党我军进行思想教育和路线教育的光辉文献。

学习毛主席的文风，还有一个重要方面是学习毛主席著作中生动活泼、新鲜有力的语言。毛主席著作中的语言，

是千锤百炼的结晶，充分体现了我国现代汉语最熟练、最精确的用法。就是在出版《毛泽东选集》的时候，毛主席仍不放过对文字的推敲。“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在《毛泽东选集》出版说明中曾说到：“选集中的各篇著作，都经著者校阅过，其中有些地方著者曾作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正。”这说明毛主席对著作中的语言总是精益求精，从而达到了思想性和艺术性的高度统一。

毛主席历来十分重视劳动人民的语言，他教导我们：“要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人民的语汇是很丰富的，生动活泼的，表现实际生活的。”又指出：“我们是革命党，是为群众办事的，如果也不学群众的语言，那就办不好。”在运用人民群众的语言方面，毛主席给我们做出了光辉的榜样。毛主席十分善于博采口语，提炼、吸收人民大众的语言，如在《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中说：“只有不要脸的人们才说得出不脸的话，顽固派有什么资格站在我们面前哼一声呢？”在《整顿党的作风》中说：“对于只谈这种空洞理论的人，应该伸出一个指头向他刮脸皮。”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讲到局部与整体关系时说：“不在一部分人民家中一时地打烂些坛坛罐罐，就要使全体人民长期地打烂坛坛罐罐。”毛主席十分熟练地把流传在劳动人民口头中的谚语运用在自己的文章中，如《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中讽刺希特勒的失败时说：“‘扁担没扎，两头打塌’”；在《论持久战》中讲避免战略决战时，引了“‘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等等。毛主席在许多地方，对流传在人民群众中的口头语作了加工、改造。如在《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一文中，讽刺国民党反动派“是借统一之名，行专制之实，挂了统一这个羊头，卖他们的一党

专制的狗肉，死皮賴脸，乱吹一顿，不識人間有羞耻事。”在这里便是把“挂羊头，卖狗肉”拆开来用，在中间添上一些词语，使这句话富于政治色彩，显得幽默生动，一针见血。

和善于创造性地运用群众语言相联系的，是毛主席最能运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说明极深刻的革命道理。无论是毛主席的讲演还是著作，都是那样明白易懂，同时又那样深刻精辟，工农兵和广大干部以及理论工作者读起来都感到深入浅出。毛主席用“两条腿走路”来说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方针，就这个比喻来说，是极为浅显易懂的，却包含着丰富、深刻的革命道理：如群众路线、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事物的互相推动、互相促进的辩证关系等光辉思想。

毛主席十分善于批判地、创造性地运用传统文学语言表达新的内容：一是古为今用，用古代语言表达新概念；二是推陈出新，创造新风格。关于前者，我们可以看毛主席对“实事求是”的新解释。“实事求是”原出自《汉书·河间献王传》，原意是“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翻译成现代汉语为：研究学问一定要掌握充分的事实根据，然后再从事实中找出真实的结论。），只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然而经过毛主席的改造，却概括了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作风的特点：

“‘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又如“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这一语录，转引自《红楼梦》八十二回，本意指贾府内的闺闱之争，可是毛主席却借用过来表达当代形势的特点和路线斗争的特点，使人感到十分贴切生动。在我们汉民族史上，“东风”往往象征着美好的事物，如“东风送暖百花开”，“东风解冻报

春来”。而西风，则是和萧条、没落连在一起的，如“古道西风瘦马”，“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由此再联想到列宁说的“先进的东方，落后的西方”，就使人感到没有再比以“东风压倒西风”来表达形势特点更准确、更生动的了。象这类例子还很多，如原是李密说他的祖母晚年病危的句子：“‘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毛主席却用来说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命运；用朱柏庐的《治家格言》“‘黎明即起，洒扫庭除’”，来说明我们不能幻想敌人自动退出历史舞台而必须坚持革命斗争的道理。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等等，都是古为今用的光辉典范。

如前所述，毛主席善于运用富有生命力的古语，加以创造，推陈出新。象下列句子，就不能简单地说是古代汉语或现代汉语：“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特别是毛主席运用传统的语言格式于党的方针政策之中，如镇反政策：“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经济政策：“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统战政策：“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乃至最近发表的毛主席语录“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都是推陈出新的光辉典范。

为了借古鉴今，毛主席还经常在文章中引用古典文学中的诗词、故事，并加以新的解释。如为了讲述唯物辩证法，在《矛盾论》中讲了《水浒》三打祝家庄的故事；为了揭露国民党挑起内战的阴谋，在《质问国民党》中引了“‘鹬蚌相争，渔人得利’”、“‘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寓言；在一九五八年写的再批判丁玲、王实味的反革命文章时，引

了陶潜的诗“‘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毛主席在关于批修整风的文章和讲话中所引的许多历史典故，更是成了我们识别刘少奇一类骗子反革命嘴脸的有力武器。

在对外来语言的使用方面，毛主席同样十分善于吸取其中有用的成分，并加以改造使之民族化。如：“因此，在他们的情绪中，在他们的作品中，在他们的行动中，在他们对于文艺方针问题的意见中，就不免或多或少地发生和群众的需要不相符合，和实际斗争的需要不相符合的情形。”这个句子有四个介词结构作状语，虽不是我国的传统句法，但我们读起来丝毫不觉得是欧化的长句，反而感到这些话完全是现代汉语。这是因为毛主席对这种外来句法作了改造，在附加成分之间接连增加了几个停顿。又如：“这时，也只是在这时，中国人从思想到生活，才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时期。”这是成份复迭句，用来强调俄国十月革命这个特定条件对中国革命的作用。这也是“五四”时期翻译文学出现后才有的新兴句法。毛主席在这里借用过来，“洋为中用”，使现代汉语更加严密化和科学化。在对外来词的使用方面，毛主席在严格按照规范化的原则的同时，加以创造性的运用。

以上是为了分析的方便，我们把毛主席对古代语言、劳动人民语言及外国语言的批判继承和大胆创新等方面分开来谈。其实，在毛主席的许多文章中，这几个方面是结合在一起使用的。如《别了，司徒雷登》说美国救济粉是“嗟来之食，吃下去肚子是要痛的。”前面一句是个典故，引自《礼记》，而后面一句，是纯粹的口头语。文言和口语在这里结合得如此紧密和谐，显得相得益彰，各得其所。

毛主席的著作不仅以强大的思想力量教育着我们，而且以形象生动的艺术语言感染着我们。读毛主席著作，那怕是

理论性很强的论著，我们之所以觉得很生动、引人入胜，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毛主席善于将深刻的说理与形象的描绘完美地结合起来。或用文学的描绘手段，把一些抽象的哲理写得通俗易懂，如在眼前；或用白描写法，把一些人物刻划得栩栩如生，维妙维肖。毛主席还十分善于将政治术语化为具体可感的形象。如毛主席对“革命”的解释，就用了诸如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革命不是绘画绣花等等具体形象，说明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这一原理。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用“宣言书”、“宣传队”、“播种机”比喻历史上伟大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也是非常形象生动的。毛主席的文章有时还在整段的抽象论述中突然插进一段形象的描绘，使读者对文章的重点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如毛主席在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时，便突然转入文学笔法描绘起来：“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这里生动形象地描绘了中国共产党人排除万难，百折不挠去争取胜利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又如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告诫我们说：“……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这后一句话非常形象、警策，同样是为了强调、印证前面说的“……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

为了使作者的和读者交流，为了从正反两方面说明事物的原理，也为了使政论文显得更形象有力，毛主席在论辩时还采取了独特的对话形式。如：“我这样说，难免有些人要发脾气。他们说：‘照你这样解释，那末，马克思也算不得知识分子了’。我说：不对。”这是采取主动进攻的办法，把对方可能反驳的错误论点堵死，造成对方被动，从而

使下面论点显得更周密，更无懈可击。“于是有人说：‘哈！你弄颠倒了，乱说一顿。’（笑声）但是，同志，你别着急，我讲的多少有点道理。”这段假拟的对话，又是多么形象风趣。用这种对话的形象方式来批驳对方的错误论点，比平铺直叙的写法要吸引人得多。

除了上述的形象化表现方法外，毛主席还十分善于运用民族语言的词汇、语法、语音等各种因素进行修辞，使语言艺术化。

如为了使文章显得精炼生动，毛主席采用对仗的修辞手段，讲究音乐美，一九五七年写的《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一文中这样描述右派的破坏活动：“呼风唤雨，推涛作浪，或策划于密室，或点火于基层，上下串连，八方呼应，以天下大乱、取而代之、逐步实行、终成大业为时局估计和最终目的者，到底只有较少人数，就是所谓资产阶级右派人物。”这段话前几句的对偶工整，但工整中又略有变化，后面几句则是对偶的扩大和发展，即运用排比手法，有力地揭露了右派分子反共反人民的丑恶嘴脸，读起来使人觉得简炼有力，把右派分子的反动嘴脸和手法揭露得淋漓尽致。又如用一个人的呼吸比喻一个政党的吐故纳新；用拟人的手法描写“教条主义”的“休息”与“起床”；用“地球就不转了”的夸张手法形容“老子天下第一”的人；用“这种办法叫‘蘑菇战术’，将敌磨得精疲力竭”的双关语来说明我军的作战方针，等等。

我们读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都有一个共同的感觉：里面揭示了深刻的道理，充满了战斗的激情，运用了精确、优美的语言。毛主席的著作，创造性地继承和发扬

了马列主义这种文风，形象的描绘往往和诗情画意结合在一起。读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人，都不会忘记毛主席用诗一般的语言歌颂即将到来的革命高潮：

**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
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
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
要成熟了一个婴儿。**

由这种崇高的理想、绚丽的色彩和奇特的想象所构成的抒情文字，雄浑中不乏优美，豪放中而含瑰丽。又如毛主席在写完《新民主主义论》后，一个新中国的形象跃然纸上，呼之欲出，他在末尾用抒情的笔调写道：

新中国站在每个人民的面前，我们应该迎接它。

**新中国航船的桅顶已经冒出地平线了，我们应
该拍掌欢迎它。**

举起你的双手吧，新中国是我们的。

由此可以看出：精辟深刻的思想和优美充沛的革命情感，充满革命浪漫主义的想象和寓意深远的意境，精炼鲜明、富于绘画美和音乐美的民族化语言，这就是毛主席政论文中所体现的诗意。

亦庄亦谐，寓庄于谐，这是毛主席语言艺术的另一特色。

严肃和幽默，战斗和愉悦，科学的态度和高度的讽刺艺术，在毛主席著作中紧密地和谐地结合在一起。毛主席把顽固分子称作“顽固专门学校”毕业时，对“顽固”作了一个十分风趣的解释：“固者硬也，顽者，今天、明天、后天都不进步之谓也。这样的人，就叫做顽固分子”。又说：“顽固分子，实际上是顽而不固，顽到后来，就要变，变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在这里，高度敏锐的观察力和尖锐辛辣

的笔锋联在一起，精确而幽默地解剖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本质及其不可避免的灭亡命运。可见，那种以为严肃的战斗不适于幽默的写法是一种误解。恰好相反，幽默不但与战斗性不矛盾，运用得好还可以增强战斗性，使敌人在革命的笑声中颤抖，在讽刺的笔锋下受伤死去。马克思在《黑格尔法权哲学批判导言》中曾说过：“世界历史形态的最后形式就是笑剧。……为什么历史这样发展呢？为了使人们含笑和过去的事情告别。”毛主席就是这样用犀利的笔触，启示我们在和一切丑恶事物告别时，要含着“笑”。这含着幽默和讽刺的“笑”，反映了“工人对自己事业具有恒心并且表明自己占着优势”（恩格斯）的乐观主义精神，和战略上藐视敌人的伟大气魄。关于这一点，毛主席在一九四九年写的《评国民党对战争责任问题的几种答案》，表现得尤为明显。这里不妨引揭穿孙科欺骗人民的一段：“孙科比较蒋介石‘公道’一点。你看，他不是如同蒋介石那样，将战争责任一塌括子推在共产党身上，而是采取了‘平均地权’的办法，将责任平分给‘各方’。这里也有国民党，也有共产党，也有民主同盟，也有社会贤达。不宁唯是，而且有‘全国人民’，四亿七千五百万同胞一个也逃不了责任。蒋介石是专打共产党的板子，孙科是给各党各派无党无派全国同胞每人一板子，连蒋介石，也许还有孙科，也得挨上一板子。你看，两个国民党人，孙科和蒋介石，在这里打架。”这里的讽刺力量就藏在对丑恶形象的尖锐揭露之中，读者由此引起的笑声，就是由于毛主席对反动事物的无情揭露而产生的胜利喜悦。再读下面这一段：“谢谢亲爱的院长，共产党虽然尚有‘诱惑及麻醉人民’的罪名，总算没有别的滔天大罪，致邀冤打，获保首领及屁股而归。”在这里，毛主席出色地运用